

● 寻根之旅

京韵大鼓与木板大鼓的交织

十九世纪末,京韵大鼓的前身、发源于直隶河间府,即今河北省沧州、河间一带的说唱艺术形式木板大鼓,经由一批背井离乡、进城谋生的鼓书艺人,进入了京津地区市民阶层的视野。在艺人们尝试着逐渐改变乡音以适应新的受众和市场之时,一位杰出艺术天才、被誉为“鼓界大王”的著名艺人刘宝全,使这种尝试呈现出划时代的崭新风采。

与木板大鼓大多演唱流传在田间地头的民间传说不同,刘宝全演唱的曲目多取自《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文学名著,以演绎金戈铁马、义薄云天的英雄故事见长。他嗓音高亢嘹亮,唱腔刚劲庄重而又华美俏俏,在举手投足间洋溢着京剧表演的“范儿”。

2006年,京韵大鼓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深厚的沧县乡音演唱的木板大鼓,是京韵大鼓、西河大鼓等北方著名鼓曲的“母根”。2020年9月,节目组同南开大学教授、曲艺理论家鲍震培女士专程赴沧县,开启了京韵大鼓的“寻根之旅”。

鲍震培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是著名曲艺理论家薛宝琨先生弟子,中国第一位曲艺理论博士,对鼓曲艺术而言,她是研究者,也是高端的发烧友。鲍震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在沧县找到两位木板大鼓传承人,他们都是国家级别的传承人,他们的演唱让我们对京韵大鼓有了更深的了解。尽管京韵大鼓和木板大鼓有所不同,但在音乐和表演风格上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木板大鼓的动作比京韵大鼓的更多,曲目也与京韵大鼓有很大的关联。京韵大鼓在内容上更多的是讲历史故事,木板大鼓的内容则更具有民间特色。”

鲍震培表示,“令人感动的是,木板大鼓更多地体现了农村风味,它保留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没有被京韵大鼓所同化,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传承人每年都会在学校和文化馆举办培训班,免费教授中小学的学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这门‘技艺’。”

鲍震培透露,著名的“刘派”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杨凤杰曾联系她并表示感谢:“杨凤杰老师表示,这是他们一直想做但未能完成的事情,有很多老艺术家都特别关心京韵大鼓的资料建设和传播传承,对于这个节目的出现,他们感到非常激动和欣慰。”

导演周晓凌受访时介绍,《津门京韵》是首次尝试以纪录片的形式对这一曲种进行系统性的呈现。她说:“节目每集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尽量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出相对全面而凝练的介绍。我通过做这个选题,也对天津的曲艺文化逐渐产生了深厚的热爱和理解,我相信这次的节目能够让观众对天津的曲艺有更深入的了解。”

资料的收集和寻找是周晓凌遇到的一大难题。比如“张派”张筱轩的资料以及老唱片等,寻找起来就十分困难。周晓凌说:“这些资料都在故纸堆里,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幸好我们得到了骆玉笙孙女骆巍巍,‘刘派’传人杨凤杰老师,‘白派’传人王莉老师,天津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倡童强等人的帮助,他们为我们的节目提供资料和支持。大家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观众了解京韵大鼓,也为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作出贡献。”

如何将这些非遗项目以最真实、最生动的方式呈现给观众是节目组思考的问题,这需要既保证对非遗项目的全面诠释,又展现出其人物故事的魅力。周晓凌说:“在制作纪录片时,不能简单地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非遗项目,也不能只讲历史,而忽视了人物的故事。非遗项目的历史感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需要

【私点追踪】



由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策划并制作的13集非遗系列节目《津门京韵》在天津卫视频道播出。京韵大鼓卓尔不群、极富魅力的艺术风采和别开生面、蔚为大观的文化景观,逾百年而不衰。该节目讲述了京韵大鼓艺术的前世今生,京韵大鼓几大流派的形成和艺术特色,特别展现了京韵大鼓在曲艺之乡天津繁荣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近日,该片主创人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讲述拍摄幕后的故事。

随《津门京韵》感受京韵大鼓艺术魅力

本报记者 张洁



我们找到历史与现代、人物与项目的完美融合点。这样,我们不仅能够较为深刻地诠释非遗项目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也能够展现出人物故事的魅力,让观众在了解非遗项目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人物的情感和精神。”

鲍震培对节目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节目选题是具有时代使命感的,节目全面、科学、客观、准确地反映国家级非遗项目京韵大鼓在天津的历史发展、风格流派、非遗保护、院团及民间的传承发展现状等,反映了天津京韵大鼓百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和所取得的优秀成绩,体现了天津各界对传统艺术的喜爱和重视,我作为天津曲艺爱好者也感到骄傲和振奋。”

● 曲艺与市民文化 一道和谐共生的人文景观

天津曲艺是天津这座近代崛起的大都市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已故相声演员侯耀文曾在一次相声赛事后赞叹天津相声演员的深厚功力,言及天津相声是一面旗帜,虽然相声在北京发源,但真正的发祥地却是天津。相声界素有“生在北京,养在天津”的说法。然而,不仅仅是相声,天津还是全国公认的“曲艺之乡”,成为北方曲艺名家的荟萃之地,北方曲艺的大本营,因此有人说:全国曲艺看天津。

自清末民初以来,京韵大鼓以异彩纷呈的流派艺术、如若星辰的名家名角,笑傲中国曲坛;其雅俗共赏的独特品质深受各阶层人们的喜爱——它是普通劳动者欣赏的艺术,也是文人雅士休闲时的趣味。直到今天,在各种曲艺演出的场合,京韵大鼓多是“攒底”节目,是中国

北方曲艺园中卓尔不群的翘楚。鲍震培介绍,京韵大鼓的音乐特色鲜明,它的音乐语言丰富多样,这种音乐特性使得京韵大鼓能够很好地演绎主旋律历史题材。京韵大鼓的音乐风格独特,它的旋律既有古典的韵味,又有现代的气息,既有激昂的激情,又有深沉的内涵。这种音乐风格使得京韵大鼓能够撑起大题材,无论是古代的历史题材,还是现代的社会题材,都可以通过京韵大鼓的旋律来传达。

鲍震培介绍,天津曲艺的历史长、根基厚,天津的曲艺观众也以懂行、热情著称,正因为天津这个“码头”的特殊性,天津成为北方曲艺演员必须跃过的“龙门”。在外地小有名气的演员,几乎都要在天津演出,只有在天津打响唱红,才能算是在艺术上站稳脚,在曲艺界获得一席之地。

城市娱乐业发达、商业演出频繁是天津曲艺发展的根本原因。

鲍震培说:“天津曲艺从一开始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演出。演出场所之间的商业竞争,导致演员的艺术竞争,当然也对演出脚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表演与创作的关系在曲艺行话中叫做‘活保人,人保活’。好的文学脚本能提高演员的艺术水平,培养观众的欣赏水平。因此,要发展曲艺,就必须考虑如何发挥市场调节与商业化的积极作用。天津曲艺表现了天津人务实的精神,摒弃华而不实的虚的东西,贴近实际生活,贴近市井百姓,表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把形式与内容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了。”

演员在天津成长就是一种财富,天津的观众培养了演员,天津的舞台锤炼了演员。反过来说,名家辈出的曲艺演出也熏陶和培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曲艺观众。天津曲艺随着天津城

市的兴旺而兴旺,不仅是历史,而且是现实,而连接天津曲艺的历史与现实的桥梁是市民文化。鲍震培说:“天津的开放性、包容性、文化连续性、创新性,促进了市民文化的发展,而曲艺在天津市民文化中更是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它既是天津文化的特色,也是市民消费的一部分。”

天津的观众,懂行、懂曲艺、懂戏,既有专业的一面,也有宽容的一面,不管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只要唱得好是真捧角儿。鲍震培说:“京、评、梆、曲、杂都是舞台艺术,实际上也是一种人艺艺术,这就需要接地气,有生活气息。外地的朋友来天津要听相声和鼓曲,这会让大家感受一种生活的松弛感。天津的曲艺跟天津的市民文化是一种共生共荣、相辅相成的关系。”

周晓凌表示,在一场中国大戏院的惠民演出拍摄中,观众和演员的互动交流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周晓凌说:“当时杨凤杰老师与老观众一起聊天的画面,很生动地反映了曲艺演员与观众之间的情感互动。在剧场内,有观众说,买票来看演出却没有《伯牙摔琴》,感到很遗憾,并打趣说,不听‘摔琴’不走。这些是现场抓拍到的瞬间,很珍贵。我们在后期制作时加入了一段《伯牙摔琴》的录音,通过这样的方式,表现天津观众对鼓曲的喜爱,展现出这样一种文化景观,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很生动,同时给人一种回味和再现的感觉。”

● 传承与发展 传统艺术与我们血脉相连

已故著名曲艺理论家薛宝琨先生曾经指出,在北方流行的各种鼓曲中,京韵大鼓是流派

最多、节目最丰、群众基础最厚的一种形式。在它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涌现了刘宝全、白云鹏、张筱轩、白凤鸣等几代男演员,他们曾分别获得“鼓王”、“泰斗”等桂冠,把这种艺术形式推向一座座“巅峰”。那个年代,京韵大鼓有刘、白、张三派之说,稍晚,后辈艺人白凤鸣创造了“少白派”。新中国成立后,骆玉笙华丽舒展、音乐性强、极富抒情色彩的骆派大放异彩,成为京韵大鼓唯一的女声流派。她为电视剧《四世同堂》演唱的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将京韵大鼓的韵味和她的典型唱腔运用其中,使骆派京韵风靡大江南北。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涌现出一批才华横溢的京韵大鼓女艺人,如良小楼、小黑姑娘、阎秋霞、小岚云、孙书筠、小映霞等,她们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刘、白等流派的特色与优良,也开创了女演员统领舞台的时代。她们卓越的艺术风采,已经成为经典的时代记忆,永远留存在曲艺迷的心中。

骆巍巍是骆玉笙唯一的孙女,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1987年,骆巍巍从天津财经大学毕业,在银行系统工作了三十多年。在孙女眼中,骆玉笙是蜚声曲坛的巨星,更是慈爱的奶奶。周晓凌说:“尽管骆巍巍并非从事这一行,但她仍然在祖母的熏陶下热爱鼓曲。她拥有许多珍贵的回忆,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手资料,比如关于骆玉笙晚年的生活、老人的坚强品格。拍摄时,骆巍巍将骆玉笙的老照片摆在家中一张长桌上,那有着历史纵深感,回忆,着实令人感动。”

回忆起一次印象深刻的拍摄,周晓凌说:“前不久,杨凤杰老师在天津离世,让人十分痛心。我们有幸在2021年时采访到杨凤杰老师,拍摄了她的弟子夏炎来探望的纪实性场景,留下了珍贵的画面。在访谈中,杨凤杰老师谈到,徒弟要用心琢磨艺术、学会更多的曲目,以便更好地为观众服务。老艺术家的风范,让我们深受感动。”

杨凤杰的徒弟夏炎是少有的京韵大鼓青年男演员。周晓凌说:“夏炎觉得文化底蕴是扎根在每个中国人心灵最深处的,只要他生在这片土地上,他在这个环境中生活,这个文化底蕴每天都在浸润着他。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他们对传统艺术的执着和热爱,让我们看到了传统艺术的生命力和活力,让我们看到了艺术的未来和希望。”

天津曲艺是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特制定更具体的《天津市曲艺传承发展计划》,以进一步推动天津曲艺的传承发展。鲍震培介绍,在人才培养方面,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天津市曲艺团等团体致力于少儿曲艺艺术培训;天津市教育局积极开展工作,举办中小学曲艺教师师资培训班;为了提高青少年对京韵大鼓等传统曲艺的认识和喜爱程度,市文化和旅游局、北方演艺集团、市曲艺团等联合主办了“天津少儿曲艺”,让孩子们走近传统曲艺,传承鼓曲文化;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南开大学等院校成为京韵大鼓等曲艺非遗研究基地。

日前,国家艺术基金2023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京韵大鼓表演人才培训》成果展示专场演出在天津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参与此次培训的30名演员悉数登台献艺。鲍震培表示:“这些爱好者最终成为了优秀的节目表演者,为京韵大鼓等传统曲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谈及《津门京韵》以来的创作感悟,周晓凌表示,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如果你想寻找更深层次的美感,从传统艺术中找寻,你会找到答案。它就像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走进它,会慢慢发现陌生越来越少,熟悉越来越多,因为传统艺术与我们血脉相连,走近它,了解它,你会发现其中的魅力所在。同时,祝愿鼓曲艺术在新时期里,创造出新的辉煌。”

非遗薪传

孙晓超 非遗传承了一种乡土情感

本报记者 胡春萌

天津是运河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兼具之地,兼容并包的文化土壤孕育了丰富的民间艺术形式,出现了样貌多元的文化团体。早年,天津人习惯将从事民间艺术活动的群众组织称为“会”,一道会就是一个民间艺术团体。堤头庆云高跷老会成立于清顺治年间(公元1653年),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该会属于文高跷范畴,扮相身段均借鉴京剧表演模式,刻画人物细腻。“80后”孙晓超,作为堤头庆云高跷老会年轻一代的传承人,在现代文化生活的包围下,他一直在思考和实践着传统高跷老会的传承路径。

那会儿都在“踩腿子”。我们那儿管玩儿高跷叫“踩腿子”。那个年代,我们那块儿还没有平房改造,每年像正月十五、十月一这种日子,村子里都会有高跷表演活动,那些锣鼓点,那些五颜六色的旗子、戏服特别吸引小孩儿。具体的内容我可能记不清了,但是那种热闹喜庆的感觉是很清晰的。堤头庆云高跷老会出会时可达一百多人,是很盛大的场面。

记者:您小时候,堤头是什么样子的? 孙晓超:堤头现在是在河北区的西北角一带,是在北运河、子牙河的交汇处,它的东边是新开河,挨着耳闸。这么一个地理位置,导致它成为水运要地,南来北往客商必经之地,一个驿站。原先那阵儿,我也听老人念叨过,很多去北京的人,得在堤头歇脚。它完全是受运河文化影响的地方。

但是吧,就是这么一种交通状况,我小时候却很少有外地人来村子里长期居住,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的时候,才有一部分外地人在我们那租房。所以邻居都很是交情很深的亲戚和朋友,是父一辈一辈的那种交情,用老天津

的话来说是“都是老门口的”。所以说在当时,它文化的传承没有断档,比如庆云高跷,都是父亲那辈儿玩儿,孩子就跟着加入队伍当中了。

记者:还记得您最早跟着大人“出会”是什么场景吗?

孙晓超:我那时候太小了,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们小孩儿一开始就打个手旗、背个样袋。样袋是类似布袋的道具,底下会有穗子,是真丝或平绒材质的,没有太多的实用功能,上面有庆云的字样。有我们这些小孩儿参加,观众看到就会觉得我们会的人多、火爆,而且后继有人。其实,我是16岁的时候才开始正式“上腿子”练的。那个时候大伙儿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传统艺术还没有那么重视,也没有非遗传承的概念,我们父辈都有自己的工作,也不怎么参加相关活动了。可是爷爷那辈儿人年龄渐渐大了,家里人也不敢让他们“上腿子”了,后来我二爷他们这帮老辈儿人就说,不行就招一帮小孩儿来学。也就是这么一个契机吧,堤头庆云高跷老会才有了我们这一

批“80后”“90后”的参与者。

非遗传承之难 承载文化的土壤变了

记者:您觉得堤头庆云高跷老会的传承,当下面临的难题是什么?

孙晓超:随着2009年堤头平房改造,原来乡里乡亲的都搬离堤头了,大家住得远了,那种父一辈一辈的文化传承就很难实现了,没有那种一起训练一起玩儿的环境了。而且,对现在的孩子来说,业余生活多丰富啊,怎么去吸引他们呢?这点是最难的。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通过微信群、抖音等,去联系会员,去展示我们的庆云高跷老会,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还能看到这项非遗。

记者:堤头庆云高跷老会被列入非遗之后,对它的传承有帮助吗?

孙晓超:我们是2008年的时候开始申报非遗的,借着这个申报非遗的契机,我跟黄勇两个人,整理了很多庆云高跷老会的历史资料,有些不清楚的

地方就问老人,那个时候其实就把我们老会的来龙去脉和家庭底儿整理清楚了。现在很多老人都离世了,要不是因为申报非遗,很多信息就留不下来了。平房改造之后,街道给我们一间房来安置“会具”。我们从2019年开始,把所有的道具、陈设重新修缮一遍。这两年,我们本着修旧如日的原则,尽力去复原老人们在记忆中的道具,比如灯图,灯图是根据清朝后期到民国初期的造型做的,天津民间花会都跟皇会有关系,我们查了很多文字图片资料,在一幅皇会图上找到了灯图。最后参照那个样式,也根据老人的描述,一点点地把灯图研究复原出来。

在当下这个环境,很多根植于传统乡土文化的非遗项目,它的传承核心是围绕一种对乡土的情感。随着城市发展,这样的非遗项目可能就没有了发展土壤。它本身就是个田间地头上的文化,非给它搬到高大上的写字楼里头,它就水土不服,再怎么救他,用多少高跷“化肥”,也没有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只能是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让这样一种进入“暮年”的非遗项目再传承几年,同时把文字、影像资料整理保存好。



堤头庆云高跷老会 承载着对堤头村的儿时记忆

记者:作为“80后”,是怎么会对高跷表演产生兴趣的?

孙晓超:我从小是在堤头长大的,我祖辈父辈都在堤头生活。我的爷爷就踩高跷,业余时间从事堤头庆云高跷老会活动。从我记事起,就在会里玩儿,看着爷爷辈父辈的亲戚踩高跷,跟他们出会,看他们演出的。后来喜欢上高跷,可能也是源自一种亲情、一种乡情,因为从小耳濡目染,不只是对高跷有感情,还有对堤头的这种乡情有比较深。

记者:在您最早的印象当中,堤头庆云高跷老会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孙晓超:1984年,堤头庆云高跷老会正式复会,我是1985年出生,我从“怀抱”的时候妈妈就带着我去二宫,看他们出会。那阵儿业余的文体活动比较少,我爷爷家哥儿仨,他们这老哥仨

